朱文莉

亨廷顿文明冲突论要旨

苏联既倒,全球震动,国际关系体系进入了几十年未遇的大变革时期。此风云变幻之际,也正是各国学者、谋士大显身手之时。于是几年来,纵论变迁、指点未来方向的论述汗牛充栋。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恐怕要数塞缪尔·亨廷顿教授的文明冲突论了。

现任哈佛大学奥林战略研究所所长的塞缪尔·亨廷顿本是以研究比较政治学特别是第三世界政治发展而知名。此番傥言世界大势,提出认识冷战后政治的全新思路,乃经过深思熟虑,精心构画。1993 年 6 月 6 日,他先在美国《纽约时报》上发表题为《未来的文明冲突也就是西方同其他地方的冲突》的文章,概要论述了自己新理论的精髓。继而出刊的夏季号《外交》季刊上面又登载了他的长文《文明的冲突?》,做进一步的详尽阐发。接着在《外交》季刊 11—12 月一期上,他又著文《不是文明又是什么?》,借回答各国学者的批评、质疑,补充一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先前为了突出论点而有意忽略的论断，使自己的立论更稳固。而且抒发一些此前为理论逻辑所限未及详言的感慨，鞭及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国内政治层面。

论者评点亨廷顿教授的观点,多以《文明的冲突？》一文为依据,这固然是不错的。但严格来讲,欲窥文明冲突论之全豹，更准确地把握亨廷顿的思想，还要综合他的上述几篇论文才行。通过这几篇或长或短的文章，亨廷顿构造了一个丰富的体系。既包含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和分析，又有实际的对策建议，亦不乏令学者们感兴趣的理论创见。这大概也就是文明冲突论能引得各方关心评说的缘故。

本文即围绕这三个层次，力图比较全面客观地展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基本观点，而不加进介绍者的评论。所据资料即前述几篇文章，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一、文明的冲突将主宰未来世界

亨廷顿在几篇文章中都开宗明义地指出世界政治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用以观察和解释世界政治的理论模式(paradigm)迫切需要更新。但学者们提出的新思路要么是虚假的，要么是非现实的，一直没能形成某种有说服力的新模式。他的理论正是要填补这个空白，要用一个以简单的范畴解释重要事件的新模型，代替已经过时的冷战模式。

在亨廷顿看来，人类历史的新阶段中冲突仍是不可避免的。而冲突的主要根源将不再是意识形态因素或经济因素，主

导人类最大纷争和冲突的因素将是文化上的差异。不同的文明之间的矛盾,将取代过去超级大国之间的对立关系,作为国际间悬而未决的最重要问题而突出出来。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

亨廷顿对文明的定义是:一种文明就是一个文化实体,是人类最高的文化集团和最广泛的文化特点。村庄、地区、种族集团、民族、宗教团体都可称为文化集团。它们的文化多样化的层次不同,文化背景亦相去甚远。人们的文化特点,或称文化属性,取决于语言、历史、宗教、习俗和制度等客观因素,也取决于人们的主观自我认定。同时,文明具有能动性,时起时伏,不断融汇分化,甚至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至于文明涵盖范围就更是捉摸不定。可能涉及到一大批人,也可能只涉及到极少数人。一种文明可能包括若干民族国家(如西方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也可能只包含某一单一民族的国家(如日本文明)。文明之间会融合交叉。文明内部可能会存在亚文明。如西方文明包括欧洲文明和北美文明两大分支;伊斯兰文明则有阿拉伯、突厥、马来分支。总之文明是个极富变化、难以限定的概念。

但亨廷顿坚持认为文明是有意义的实体。尽管文明之间的界限不明显,但不同的文明的确存在并活动着。冷战后的世界如果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或经济发展水平来划分,则难以揭示全球发展的大势。现在需要的是按文化和文明背景来划分国家,要认清新的世界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几大文明的相互作用。因为未来全球性的政治冲突将主要发生在具有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和集团之间,文明之间的分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

认为世界上存在多种文明，文明的相互作用影响着人类的发展,这当然不是什么新观点。不过把重点放在文明的差异和冲突之上，并断言文明的冲突将成为未来国际政治的核心，就是亨廷顿自认为的创见了。

他为自己的看法提出了六点理由。一,文明的差异不仅实际存在,而且是根本性的。二,世界的距离在缩小。不同文明的相互影响日益加深。这种日益加剧的相互影响反过来又加剧了人们的文明意识，加剧了历史上由来已久的分歧和敌对情绪。三,全球的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革进程正在把人们从长期以来的地方属性中分开,削弱民族国家的属性。而在世界的部分地区,宗教起而填补了这个真空。西方的基督教、犹太教、佛教、印度教以及伊斯兰教中都出现了所谓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四,西方以其独特的双重作用刺激了其他地区文明意识的发展。五,文化特点和差别不易改变,不像政治和经济特点那样容易被冲淡和消除。六,经济地区化进程在蓬勃发展。它也在从两方面推动文明在国际政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亨廷顿提出的庞庞杂杂六条论据大致可归为三类。其中一、五两点论据实际上是支持这么一条论断 文明的固有特点决定了文明冲突不可避免 。不同文明,其历史、语言、文化、传统、宗教都不相同,因而受不同文明熏染的人对神与人、个体与群体、臣民与国家、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对权利与责任、自由与权威、平等与等级秩序孰轻孰重也有不同认识。这些观念分歧已经存在了几百年，比政治思想和政治体制的差异更为根本。正是这些文明的差异造成了最漫长、最残暴的冲突。

而且文化特点的根深蒂固，决定了这些分歧不会迅速消

失。政治立场可以改变,经济地位可以变迁,但文化特点往往是抹煞不掉的。正如亨廷顿举的例子,在前苏联地区,共产党人可以转变为民主主义者，富人可变成穷人，穷人可变成富人。但是,俄罗斯人不能成为爱沙尼亚人,阿塞拜疆人不能成为亚美尼亚人。一个人可以是半个法国人、半个阿拉伯人,甚至可以同时是两个国家的公民。但是,要想成为半个天主教徒和半个穆斯林，那就比较难了。

亨廷顿的二、三、六点论据共同用来说明另一层意思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趋势决定了文明冲突将主导未来。这里他谈到了大家公认的世界经济的双重倾向——全球化与地区化,并且认为这两种倾向都增加了文明冲突的可能性。一方面，经济的现代化特别是通讯和交通联络的日益发达缩短了人们之间的距离,使全球各地紧密地结合成一个整体。但空间距离的缩短并没有相应地缩小人们心理上的距离。不同文明的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断增强，使人们对文明间的差异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对其他文明的歧异和敌视情绪可能更深了。这反而加强了同种文明内的自我意识和认同感。另一方面,经济地区化进程在迅猛发展。亨廷顿认为,已有的经验证明共同的文明基础是地区经济一体化成功的保证。他指出欧共体的基础是共同的欧洲文化和西方基督教；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功取决于目前正在合为一体的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的文化 共同的文化显然正在促进中国大陆与香港、台湾、新加坡及亚洲其它国家海外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迅速发展；文化和宗教也是包括 10 个非阿拉伯穆斯林国家的经合组织的基础。相比之下,日本想在东亚地区建立类似的经济实体就有困难,因为日本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社会和文明类型。不管日本与其他东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国家可能建立多么强大的贸易和投资联系，它与那些国家的文化差异限制甚或妨碍它倡导像欧洲和北美那样的地区经济一体化。如此看来，随着冷战的结束，文化共性日益战胜意识形态分歧，文化共性正在成为经济一体化的先决条件。而成功的经济地区化进程又将加强文明意识，突出文明在冷战后国际关系中的核心作用。

亨廷顿的第三个论断是西方在国际关系中地位的变化加强了文明意识的发展和文明冲突的机率。他认为西方仍处在权力的顶峰，但来自非西方的挑战情绪也在滋长。西方对于其他地区文明意识的发展起着双重作用，但其形式不同于以往。过去，非西方社会的精英通常是那些与西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等也受过教育，吸收了西方的价值观的人。同时，非西方国家的大众往往仍然深受本地文化的影响。然而,现在这些关系正在发生逆转。在许多非西方国家，西方（通常是美国的）文化行为方式和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越来越流行。与此同时，精英阶层正在逐渐褪去西方化的色彩，从而日益本国化。在大部分国家和大部分宗教中，积极参与原教旨主义运动的是受到高等教育的中产阶层年青技术人员、专业人员和商业人员。

在这些论点的支持下,亨廷顿断言,尽管民族国家仍将是世界事务中最强大的因素，但未来主要的全球性冲突将在具有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和集团之间展开。各国政府和集团越来越不能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争取得到支持并组成联盟，他们于是转而向同种文明的其他成员呼吁支持。政治家、宗教领导人和新闻媒介都把文明意识看作动员群众支持和向政府决策者施加压力的新的有效办法。总之，文明的作用在增强，各

种文明之间出现现实和重大的差异，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和其他形式的冲突，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全球冲突形式。

二、西方对非西方

建立了一个自称可以自圆其说的理论模式之后，亨廷顿开始用它来解释冷战后的现实世界。按照文明冲突的观点，世界格局取决于八大文明的相互作用，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一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不过亨廷顿对非洲文明的地位还略显怀疑。他认为其中相邻的文明集团将不断发生暴力冲突，争夺对领土的控制权。在更高一层的宏观水平上，所有这些文明集团都在竞相争夺经济权力，争夺对国际组织的控制权，推广自己特有的政治和宗教价值观，扩大自己的文化影响。

从这一系列文明的冲撞中，亨廷顿又提炼出一个“未来世界政治的轴心”西方与其他即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或换个角度说，非西方文明对西方力量和价值观念的反应。这里的西方基本上还是它在冷战时期的含义。亨廷顿声称由于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崩溃，西方现在超乎其他文明之上，处于异乎寻常的力量的顶峰。西方的军事力量是无敌的。除了日本之外，西方在经济上没有面临任何挑战。它控制着国际政治和安全机构，并同日本一道控制着国际经济机构。全球的政治和安全问题由美国、英国和法国协调有效地加以解决，世界的经济问题则由美国、德国和日本联手处理。这些国家彼此的关系极

为密切，在不同程度上把非西方国家排除在外。

非西方国家对此的反应是不同的。亨廷顿把这些反应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极端的情况是，少数国家如缅甸、朝鲜等试图自我孤立,使自己的社会不受西方‘ 腐化 ’的渗透,实际上是不参加由西方控制的国际大家庭。然而，采取这种方针的代价是高昂的，很少有国家单独采取这种方针。第二种反应就是设法加入西方的行列，接受它的价值观念和制度。第三种态度是设法同西方保持平衡，发展经济和军事力量，同其他非西方社会合作对付西方，同时保持固有的价值观念和制度；简而言之，实现现代化而不是西方化。可见那些支持建立新秩序的热心者低估了西方面临的反抗情绪。事实上，除了一部分赶潮流的国家外，众多的非西方国家不满意，也不会欣然接受目前这种西方文明优势固定化。如果在非西方国家的人民中进行民意测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疑将得到财政部长和其他少数人的支持，但是在普通民众中支持率将极低。大部分人认为西方实际上正在使用国际机构、军事力量和经济资源保持西方的优势、维护西方的利益并推广西方的政治和经济价值观念。亨廷顿直言不讳地说：“ 他们的看法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真实成分。”

他认为力量的差别以及为争夺军事、经济和机构的权力的斗争确是西方和其他文明之间的冲突根源。文化上的差异，也就是基本价值观念和信仰的差异，是隐藏其后的第二个冲突的根源。从表面来看，西方文化已渗透到世界的其他地方。然而，就其本质而言，西方的概念同其他文明的普遍观念有着根本差别。西方有关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立宪主义、人权、平等、自由、法治、民主、自由市场以及政教分离的概念同伊斯

兰、儒家、日本、印度教、佛教或东正教文化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西方想努力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传播这些概念，但引起的反应却是对“人权帝国主义”的抨击和固有价值观念的复兴，这可以从非西方社会中年轻一代支持宗教原教旨主义中看出来。认为可能存在一种普世文明是西方的概念，它同大多数亚洲社会强调绝对忠于一个党派、承认民族间差异的传统直接冲突。其实，“在西方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在全世界却最不重要”。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千方百计吸引其他国家的人民采纳西方有关民主和人权的概念。事实上非西方社会出现民主政府，常常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或者是外界强加的。众多的非西方国家由于与西方在文化特色上的冲突，和对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和地位的争夺，不想或不能融入西方文明。它们试图通过发展自己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同西方竞争，试图建立现代的而又非西方的文明。它们继续谋求从西方得到技术、专门知识、机器和武器，力量不断接近西方，但价值观念和利益却与西方大相径庭。于是就形成了亨廷顿眼中非西方与西方对抗的态势，他认为这才是冷战后西方需要认真研究、小心对待的安全威胁。西方目前虽然还掌握着主导权，但脚下的地基已经不稳了。具体来说，西方面临的挑战是：

1. 伊斯兰文明的挑战。亨廷顿引用一位穆斯林作家的话说,西方的‘下一场冲突必将来自穆斯林世界”。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已持续 1300 年了。本世纪一度出现西方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但二次大战后，西方开始退却，阿拉伯民族主义首先兴起，接着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冷战结束以来的种种迹象表明，两大文明之间绵延几个世纪的军事冲突不会减弱，而且可能会更加激烈。在海湾战争中，虽然只有少数几

个穆斯林政府公开支持萨达姆·侯赛因,但许多阿拉伯杰出人物私下为他喝彩，他在阿拉伯大部分公众中非常得人心。继而发生的前南斯拉夫的冲突中，西方公众表示同情和支持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对他们遭受塞族的虐待表示痛心，然而对克罗地亚攻击穆斯林并参与肢解波黑却很少表示关心。伊斯兰世界严厉谴责西方采取双重标准。伊朗领导人敦促各国穆斯林向波斯尼亚提供援助 据说,到 1993 年,有来自二十几个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在波斯尼亚作战。

亨廷顿进一步描述说：伊斯兰文明对现有秩序的挑战不仅表现在它同西方文明在欧洲的冲突上。从非洲之角到中亚，穆斯林同巴尔干地区信仰东正教的塞族人、印度的印度教徒、缅甸的佛教徒和菲律宾的天主教徒也发生暴力冲突。“伊斯兰的边界到处流淌着鲜血。”

2. 儒教文明的挑战。亨廷顿提出这个论断的理由主要是：冷战后若干儒教文明圈内的国家不仅积极地扩充自己的军事力量，而且大量向中东国家输出高技术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暗地支持伊斯兰文明同西方直接对抗。

这其中他特别谈到中国。他认为冷战后西方国家几乎毫无例外地在削减军力。叶利钦领导下的俄罗斯也加入这个行列。而中国在引人注目的经济发展支持下,迅速增加军费,大力推进武装力量现代化，不断扩大军事力量。比如中国从前苏联国家购买武器,研制远程导弹,并在 1992 年试验了一个百万吨级的核装置。再如中国获取了空中加油技术并试图购买一艘航空母舰，以发展军队投放能力。亨廷顿还指责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引起东亚的多边军备竞赛。而且他声称中国还是军火和武器技术的出口大国。他声称中国向利比亚和伊

拉克出口了可用于制造核武器和神经毒气的原料，帮助阿尔及利亚建造了一个可用于核武器研究和生产的反应堆，向伊朗出售了美国官员认为只可能用来制造武器的核技术，且显然给巴基斯坦运去了射程为 300 英里的导弹的部件。除中国以外，朝鲜也向伊朗和叙利亚出售了先进的导弹和导弹技术。同时还存在武器从中东流向东亚的情况。如中国从巴基斯坦获得‘毒刺’导弹。

在亨廷顿看来，这就形成了一种儒教与伊斯兰教的军事联系，目的在于获得对付西方的军事力量所需要的武器和武器技术。于是一种新的军备竞赛在伊斯兰一儒教国家与西方之间出现。一方面，这些非西方国家自称有权获得和部署它们认为对它们的安全所必要的无论什么武器，并结成了“由扩散者及其支持者参加的‘叛逆者’互相声援的条约”。另一方面，西方试图通过国际协定、经济压力和控制军火和武器技术的转让，来防止非西方国家发展可能威胁西方利益的军事能力。

3. 动摇不定的夹缝国家。亨廷顿指出非西方国家同西方的疏离感是不同的。与西方文明的隔阂对拉美和东欧国家来说是最小的，对前苏联的东正教国家则大些，对穆斯林、儒教、印度教和佛教社会则更大些。即使是决心成为西方非正式成员的日本，在一些重要方面亦显然不同于西方。如果说儒教一伊斯兰教联手反对西方，但与这个联盟相邻的一些非西方国家似乎尚未明确自己在这场对抗中的立场。他们在是否认同西方文明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其国家内部也因此产生了分裂。亨廷顿举了土耳其、墨西哥、俄罗斯为例来说明自己的论点。

他认为土耳其是其中最典型的。土耳其的领导人遵循凯末尔的传统，确定土耳其是一个现代的、世俗的西方国家。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们使土耳其加入北约,在海湾战争中同西方结成联盟,还在申请加入欧共体。然而与此同时,土耳其社会中的显要人士一直支持恢复伊斯兰制度，认为土耳其基本上是一个中东穆斯林社会。他们指出,虽然土耳其的统治阶层一直确定土耳其是一个西方社会,但是西方的统治阶层拒绝接受土耳其,不会同意土成为欧共体成员国。实际原因如厄扎尔总统所说:"我们是穆斯林,他们是基督教,他们不这么说而已。"

在过去 10 年里，墨西哥采取了多少类似土耳其的立场。就像土耳其放弃历来反对欧洲的态度而试图加入欧洲一样，墨西哥已经停止以反美自居,而试图模仿美国,并同它一起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但对前总统萨利纳斯主导的这一进程,墨西哥国内存在许多反对意见。

不过亨廷顿声称,从全球来看,最重要的分裂国家是俄罗斯。俄罗斯是西方的一部分还是性质截然不同的斯拉夫东正教文化的首领,是俄罗斯历史上的老问题。共产党在俄罗斯的胜利一度把这个问题掩盖起来。俄输入了一种西方的意识形态,使它适应俄国的情况,然后以那个意识形态的名义向西方挑战。传统的关于西方化还是俄罗斯化的辩论中断了一段时间。现在俄罗斯人又遇到这个问题，而统治阶层和公众对此都存在意见分歧。叶利钦总统采纳西方的原则和目标,试图使俄罗斯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和成为西方的一部分。然而他的反对者中有不少人都认为应当抛弃这种"大西洋主义"的方针。1992 年春在俄罗斯欧洲部分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40%的公众对西方抱有积极的态度，36% 的公众抱有消极的态度。

亨廷顿提出一个分裂的国家要重新确定其文化特性必须

达到三个必要条件。第一,其政治和经济领导层必须总的来说支持这个行动。第二,国内公众必须愿意默许重新确定文化特性的工作。第三,所接受的文化中的统治集团必须同意这种转换。他认为这三个必要条件在墨西哥来说大部分都存在。前两个条件对土耳其来说大部分存在。但俄罗斯是否存在任何一个条件还不清楚。

在充满忧虑地分析了世界局势，或更确切地说是西方的处境之后,亨廷顿明确站在西方一边,提出了控制未来世界的对策。即促进西方本身的文明,尤其是欧洲和北美的组成部分之间更大的合作和团结 把东欧和拉美社会融入西方,因为它们的文化接近西方文化 保持与俄罗斯和日本的密切关系 支持同情西方价值和利益的其他文明集团；加强体现并使西方利益和价值合法化的国际机构。限制潜在的敌对文明——主要是儒教和伊斯兰文明——的军事势力的扩张，并利用儒教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分歧。因此需要改变削弱西方军事能力的作法，尤其是要保持美国在东亚和西南亚的军事优势。

不过亨廷顿也指出,从长期发展看,西方将越来越不得不接纳这些非西方的现代化文明。这就要求西方要更深刻地了解其他文明基本的宗教和哲学观念。要认识到,在可预见的将来,将不会有普世文明,而只有各种不同的文明,每一种文明必须学会同其他文明共处。

三、理论挑战：一箭双雕

亨廷顿解释说，自己提出文明冲突论是为了填补冷战结

束后国际关系分析的空白，取代不合时宜的三个世界的划分，建立解释国际政治的新模式。但冷战后国际关系模式分析中真的出现了空白吗？像本文开始谈到的那样，各国论者的文章、专著多如过江之鲫，而却被亨廷顿视若无物。他要生面别开，重新构筑一个分析模式，既是出于分析国际变革的需要，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出于对已有模式的不满。在就《文明的冲突》一文与同行们的论辩当中，亨廷顿把自己学说中隐含的理论挑战昭示出来，声言自己的矛头分别指向虚假的模式和非现实的模式。

亨廷顿所谓虚假的模式，指的是为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学者、地缘政治学者所热衷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模式。他不同意继续以国家为分析国际政治的基本要素，更不同意所谓国家利益、国家间权力的平衡是形成未来世界格局的杠杆的说法。他指出人们最终所能依靠者，不是政治意识形态或经济利益。人们在愿意认同，并能不惜生命为之战斗的是信仰和宗族、血缘和信念。

亨廷顿在反驳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学者时说，当然，一个国家是要寻求与其它国家之间的势力均衡。不过，如果那是一个国家要追求的所有目标，那么西欧各国在 40 年代末也许早该同苏联勾结，与美国对抗了。当时的西欧各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感觉到了来自东方的威胁，结果它们并未按地缘政治的思路行事。

亨廷顿承认文明是由国家组成的，国家今后在世界事务中仍将是最有力的行为体。但他指出国家同时也属于不同的文明。随着冷战时代三个世界划分的消失，国家趋向在文明的范畴内认定自己的特性及利益。比如西欧的国民和政府现在

认为，来自南方的文化威胁正在取代过去来自东方的意识形态威胁。亨廷顿强调我们并不是生活在相互之间毫无联系的“孤立的国家”组成的世界里(这是他的辩论对手福阿德·阿贾米提出的概念)。我们的世界是由相互间部分重叠的多种国家群体组成的，这些群体在不同程度上以共同的历史、文化、宗教、语言、地理和机构为基础，而基础最广泛的国家群体就是文明。如果否认文明的存在，就等于否定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

亨廷顿学说的另一面锋芒指向普世文明观，即他所说的非现实的模式。在他之前，也有些学者强调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但一般都把文化当做促进各地区、各民族沟通、融合的积极因素看待。部分人还认为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全球性的文化也在兴起，从而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一体化，为迅速消弥分歧和冲突奠定了基础。同是强调文明的作用，亨廷顿却指出文明可以使人类团结起来，也可以使人们反目成仇。不研究清楚文明的本质，就不可能遏制住引起文明间冲突的力量。

他指责持普世文明观的人以普世文明当今存在并且今后也将继续存在这一假设为自己主张的前提，而这个前提却经不起简单的推敲。第一，有些人认为苏联的崩溃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和自由民主在全球取得普遍胜利（他在此暗指弗朗西斯·福山 1990 年发表的《历史的终结》一文)。亨廷顿批评他们仍抱着冷战时代的思维方式不放，认为取代共产主义的唯一选择是自由民主制度，而前者的崩溃即是后者胜利。他指出即使是在苏联消失之后，也还存在且活跃着多种多样的政治形态，如集权主义、民族主义、市场共产主义(像中国)等。更重要的是，还存在着世俗意识形态之外的宗教选择。总之，认

为苏联的消失意味着西方一劳永逸地赢得了世界，纯属狂妄自大。

第二,有人认为通讯和交通发展扩大了相互交流,于是形成了共同文化。亨廷顿反驳说，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中才会如此。而历史证明，在接触频繁的社会之间往往最易发生战争。相互接触即加强一个社会固有的特性，又引发不同社会间的抵触、反抗、对立情绪。

第三,有人认为,既然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具有(相对于多样化社会)均质作用,那么就能形成与本世纪的西方文化极为相近的共同的现代文明。亨廷顿却看到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化,尽管在当代世界中,大多数现代化社会是西方社会。日本、新加坡、沙特阿拉伯形成了现代的繁荣社会,然而很明显,它们是非西方的。认为实现了现代化的其他地方的人们也应该“像我们一样”,这实际上反映出西欧的傲慢,而且本身就是文明冲突的表现。亨廷顿争辩说,认为斯洛文尼亚人与塞尔维亚人、俄罗斯人与塔吉克人、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阿拉伯人与犹太人、日本人与美国人可以同属于西方决定的一种普世文明,只是脱离现实的想法。

他总结说,普世文明只能是普世权力的产物。罗马帝国曾创造过的文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谓近似于普世文明。19世纪的西欧列强通过殖民主义，20世纪的美国通过霸权主义,曾使西方文化扩展到现代世界的许多领域。然而,欧洲殖民主义时代早已终结,美国的霸权也正在走下坡路,紧随其后的将是西方文明的衰落。非西方文明的民族和政府不再是西方殖民主义的目标,不再是历史的奴隶。它们与西方共同推动和决定历史的发展。国际政治走出了西方阶段,世界事务的中

心成为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间以及非西方文明内部的互动。因此，亨廷顿坚信未来的世界将处于文明政治格局之下。

（作者朱文莉，北京大学讲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